

# 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异及形成机制

周春山<sup>1</sup>, 边艳<sup>2</sup>, 张国俊<sup>3</sup>, 胡锦涛<sup>1</sup>

(1.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 广州 510275;

2. 广州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广州 510006; 3. 广东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广州 510320)

**摘要:**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产阶层规模不断发展壮大, 并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群体, 其不断增长的居住空间需求对社会空间结构具有较大影响。本文研究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异及形成机制, 为政府制定人口发展规划、城市更新等政策提供参考依据。首先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法、聚类分析法、集中度指数分析了广州市2010年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布及特征, 并将中产阶层聚居区划分为教育、职业、收入和混合4个亚类聚居区。其次, 将2010年中产阶层聚居区与2000年的聚居区比较, 发现2000-2010年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与地域类型演变呈现以下特征: ①中产阶层聚居区区域范围有所扩大, 呈现郊区化与向中心性并存现象; ②老城区外围、珠江两岸及经济开发区是中产阶层集中分布的区域; ③中心城区内城中村外来人口的集聚带来中产阶层的逐渐消失; ④4个亚类中产阶层聚居区呈现街道数目改变和类型转换的变化; ⑤中产阶层聚居区呈现强稳定型、弱稳定型、衰减型和增长型4种不同地域类型的变化。最后, 本文从社会阶层分化、房地产市场、全球化、传统社会空间历史延续以及个体力量和城市建设等方面对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异形成机制进行探讨。

**关键词:** 中产阶层聚居区; 空间分异; 地域类型; 形成机制; 广州市

DOI: 10.11821/dlxb201612002

## 1 引言

中产阶层 (the middle class), 又被称为“中产阶级”、“中间阶层”, 其概念源于西方社会理论, 是对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群体的解释<sup>[1]</sup>。早期, 卡尔·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 认为中产阶层主要包括小商人、小工业家、小自由农、牧师和为数不多的管理者<sup>[2]</sup>。后期, 美国社会学家Mills<sup>[3]</sup>认为中产阶层主要是指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阶层, 主要包括管理者、技术雇员等薪金雇员。学者们通常把早期的中产阶级认为是老中产阶层, 后期的为新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一直以来都是西方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等领域学者关注的对象。西方社会地理学家认为中产阶层影响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环境、劳动力市场、住房选择, 尤其是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变化具有影响作用<sup>[4]</sup>。

20世纪20年代, 西方学者结合三大经典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型<sup>[5-7]</sup>认为中产阶层聚居区主要集中在中心区外围, 紧邻高级住宅区的区域。二战后, 随着西方国家城市中心城区社会问题的加剧, 以中产阶层为先导的郊区化带动商业、工业和办公业的外迁<sup>[8]</sup>, 中产阶层成为推进郊区化进程的主流群体。郊区化常被西方学者描述成是强化中产阶层家庭

收稿日期: 2016-01-28; 修订日期: 2016-08-0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71182) [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1271182]

作者简介: 周春山(1964-), 男, 河南信阳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1667M), 主要从事区域发展与城乡规划、城市地理学、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研究。E-mail: zhouchs@mail.sysu.edu.cn

通讯作者: 边艳(1985-), 女, 河南商丘人,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学。E-mail: bian-yan2008@163.com

2089-2102 页

关系的过程<sup>[9]</sup>。对于大多数中产家庭,尤其是有子女的中产家庭,搬迁到郊区居住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sup>[10]</sup>。20世纪60年代内城成为中产阶层居住选择的新方向<sup>[11]</sup>,而这些中产阶层大多数属于经济富有、教育文化水平高、年轻、单身或已婚的,但不超过2个子女的人群,即所谓的“雅皮士”(Yuppies)<sup>[12]</sup>。为了应对生活中各种机会和制约因素,中产阶层回迁至市中心区居住的现象呈现增长趋势<sup>[13-15]</sup>。西方学者对于中产阶层聚居区的形成机制也进行了研究。Bell<sup>[16-17]</sup>从生活方式的角度出发,认为在郊区居住的大都是“家庭主义”者,即注重家庭生活质量,主要看中郊区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试图将自己置身于低犯罪率、没有穷人、移民和不受侵害的生活环境,并采用不同的邻里行动模式来捍卫自己的“郊区天堂”。Bridge<sup>[18]</sup>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对中产阶级回迁市中心现象进行了剖析,他认为子女数及子女年龄影响中产家庭居住空间的选择。Karsten<sup>[15]</sup>指出,中产家庭选择居住在市中心的主要原因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市中心的居住区有助于管教子女和方便上班,尤其是对女性来说;二是通过社会网络拥有的大量社会资本累积使中产阶级家庭愿意留在市中心。Boterman等<sup>[19]</sup>通过对阿姆斯特丹中产阶层化过程的研究发现,大多数中产家庭表示一旦有孩子更愿意搬迁至郊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不断分化,中产阶层迅速崛起。中国地理学者更多地是从空间的角度关注社会区类型的划分。相关研究表明,中国一些大城市已出现明显的中等收入阶层聚居区或中产阶层聚居区。南京<sup>[20]</sup>中上阶层聚居区主要由中级政府职员、知识分子、个体工商业者、企业中层管理者、金融证券从业者构成。北京<sup>[21]</sup>中等收入聚居区主要由城市新贵、外企合资企业管理阶层、私营企业老板以及从事IT业、房地产业、电讯业和高科技产业的白领构成,区内居民人均收入较高,有较好质量的住房。广州<sup>[22]</sup>中等收入阶层聚居区内居民收入较高,居住条件好。随着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城市更新与旧城改造的不断深入,中产阶层相关研究成为国内一些地理学者关注的热点<sup>[23-28]</sup>。

不同于地理学者,社会学者研究中产阶层更多地从阶层界定及特征入手。中国中产阶层的界定和划分,社会学者<sup>[29-30]</sup>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总体相差不大,基本上都是从收入、职业、教育等方面来界定,认为中国中产阶层主要是以脑力劳动为主,拥有较高工资及薪金,职业类型主要有私营企业主、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外企白领、企业和社会组织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等。

广州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对外开放的先行者,是全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之一。近年来广州市人口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人口郊区化现象更加明显<sup>[31]</sup>,其社会阶层变化引起学者们广泛关注。因此,研究广州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布及地域类型演变有一定的代表意义。课题组在对广州市社会区划分的基础上,提取了中产阶层聚居区,于2014年下半年在中产阶层聚居区内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共发放1200份,有效问卷1130份。通过综合中产阶层生活方式成本推算法和社会阶层比例法对广州市中产阶层进行界定<sup>[32]</sup>,得出广州中产阶层的特征体现在:家庭年收入40~200万或个人年收入17~80万,个人或家庭收入较高;拥有多套住房、多辆中级和中高级汽车等。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广州市中产阶层是以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商业服务业人员为主,文化教育程度以大学本科为主,经济收入水平高,住房条件好的社会群体。

## 2 研究设计

本文研究区域为2013年行政区划调整前的广州市10区,即越秀区、荔湾区、天河

区、海珠区、白云区、黄埔区、番禺区、花都区、萝岗区、南沙区, 共计148个街道(镇), 本文将其划分为4个圈层: 老城区、中心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图1)。

本文采取因子生态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及区位熵法, 结合韦伯社会分层理论, 构建了能够表征社会阶层组织资源(权力)、经济资源(财富)和文化资源(声望)3种资源以及基本情况在内的指标体系(表1), 对广州社会区类型、中产阶层聚居区亚类进行划分, 并对中产阶层聚居区亚类地域类型的演变进行分析。

数据来源于2000年和2010年广州市第五、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及广州市统计资料。研究思路在对2010年广州市社会区划分的基础上, 分析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的空间分布、社会特征, 并对中产阶层聚集区进行亚类划分。然后与2000年的数据进行比较, 总结出2000-2010年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布变化与地域类型演变规律。



图1 研究范围

Fig. 1 Study area

### 3 2010年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特征及亚类划分

对第六次人口普查的84个变量进行因子生态分析, 提取累积方差贡献率大于70%的5个主因子, 根据各主因子在各街道的得分, 采用聚类分析法对各街道进行聚类分析, 将聚类分析结果和实地考察进行综合判定, 最终将广州市划分为5类社会阶层聚居区(图2): I 阶层混合聚居区、II 中产阶层聚居区、III 一般工薪阶层聚居区、IV 农民阶层聚居区和V 工人阶层聚居区。结合广州市情况, 将广州市社会区空间结构进行抽象化(图3)。通过对中产阶层聚居区职业、教育、住房等特征分析发现(表2), 该聚居区内中产阶层特征与前期研究结论<sup>[32]</sup>是相符合的。该聚居区空间分

表1 2000年与2010年广州市社会区分析所选变量  
Tab. 1 Variables for the social areas analysis in Guangzhou in 2000 and 2010

变量类型	2000年社会区研究		2010年社会区研究	
	变量	数目	变量	数目
基本情况	家庭结构	5	家庭结构	5
	年龄结构	3	年龄结构	3
组织资源	职业结构	7	职业结构	7
	行业结构	16	行业结构	16
	在业情况	7	在业情况	7
	租房费用	9	租房费用	9
经济资源	购房费用	9		
	不同年代住房面积	6	不同年代住房面积	7
	人均住房面积	8	人均住房面积	8
	住房来源	7	住房来源	7
	教育人口	8	教育人口	8
文化资源			受教育程度就业人员	7
总计		85		84

布也符合广州市实际情况,主要集中在农林街、梅花村街、建设街、华乐街、黄花岗街、新港街、五山街等39个街道,其中26个街道位于中心城区,4个街道位于老城区,9个街道位于近郊区。

### 3.1 中产阶层聚居区特征

本文采用集中度指数(区位熵或地区专业化指数)来把握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特征。其计算公式如下:

$$LQ_i = \left( Q_i / \sum_{i=1}^n Q_i \right) / \left( P_i / \sum_{i=1}^n P_i \right) \quad (1)$$

式中:  $Q_i$  代表了  $i$  社会区某一类人员的人口数;  $P_i$  为  $i$  社会区某一类型人口总数;  $n$  为社会区数目; 集中度指数  $LQ_i$  大于1, 表示该类型人员在该社会区聚居程度相对集中,  $LQ_i$  越大, 则聚居程度越高, 表示该类型人员是该社会区的主要聚居群体。相反,  $LQ_i$  小于1, 表示该类型人员不是该社会区的主要聚居群体。2010年广州市社会区职业类型、教育水平和住房来源的集中度指数如表2所示。

**3.1.1 职业类型主要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为主** 从表2可以看出, 中产阶层聚居区内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的空间集中度较高, 表明这3种是该聚居区的主要职业类型。从不同职业人员在各社会区内的集中程度来看,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在中产阶层聚居区和一般工薪阶层聚居区的集中度指数较大, 分别为1.97、1.11。专业技术人员在中产阶层聚居区的集中度最高, 其次是混合阶层聚居区, 为1.41。商业服务人员在混合阶层聚居区的集中度最高, 其次是一般工薪阶层聚居区。农林牧渔人员则主要密集分布在农民阶层聚居区。

**3.1.2 教育程度以高层次教育水平为主** 中产阶层聚居区内受研究生教育、专科和本科教育、小学到高中、未上过学教育程度人口集中度指数分别为1.96、1.54、0.84、0.67(表2), 表明该聚居区内高层次教育人口分布较为集中。从不同受教育程度的集中度指数在各社会区密集情况来看, 高学历人才除了集中分布在中产阶层聚居区, 还集中分布在混合阶层聚居区和一般工薪阶层聚居区, 只不过相对密集程度较低。未上过学的人员在农民阶层聚居区内高度密集。其他受教育程度在各社会区内密集程度相差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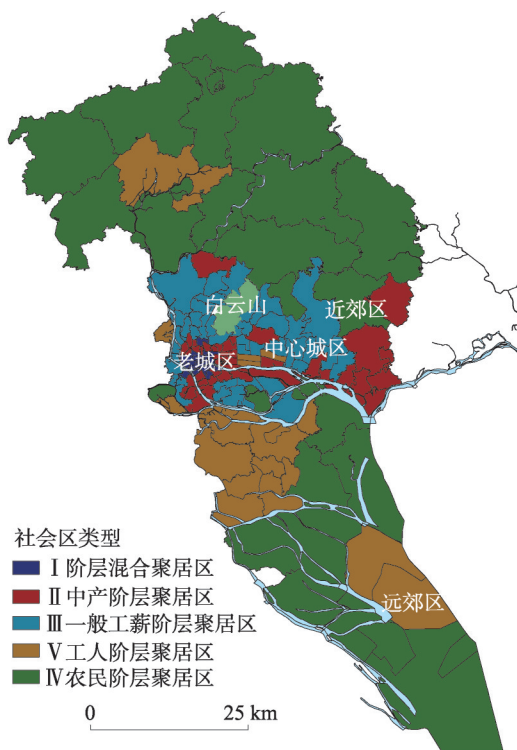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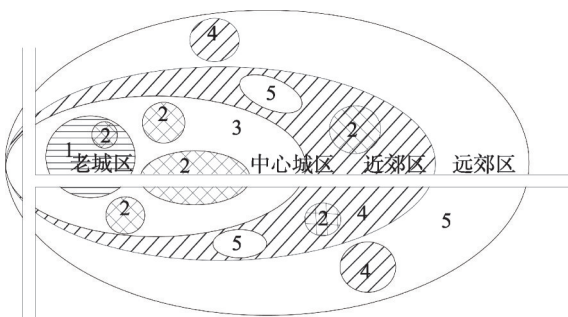


图2 2010年广州市社会区类型及分布

Fig. 2 Type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ocial areas in Guangzhou in 2010



1 阶层混合聚居区 2 中产阶层聚居区 3 一般工薪阶层聚居区  
4 工人阶层聚居区 5 农民阶层聚居区

图3 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抽象图

Fig. 3 Structure patterns of the social areas in Guangzhou



表2 2010年广州市社会区职业类型、教育水平、住房来源集中度指数  
Tab. 2 Concentration ratio of occupation types, education levels and housing sources  
of the social areas in Guangzhou in 2010

社会区	中产阶层 聚居区	混合阶层 聚居区	一般工薪阶层 聚居区	工人阶层 聚居区	农民阶层 聚居区
街道及分布	农林街、梅花村等39个街道，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	沙面街、岭南街、华林街等22个街道，集中分布在老城区	官洲、前进街、江海街、林和街、龙洞街等41个街道，集中分布在紧邻中产阶层聚居区的中心城区	新造镇、钟村镇、金沙街等20个街道，集中分布在近郊区	化龙镇、九龙镇、萝岗街等26个街镇，集中分布在近远郊区
职业类型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	1.97	0.67	1.11	0.72
	专业技术人员	1.49	1.41	0.98	1.04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1.44	1.54	0.96	0.91
	商业服务业人员	0.94	1.52	1.26	0.86
	农林牧渔生产人员	0.10	0.03	0.12	0.55
	生产运输设备人员	0.87	0.39	0.90	1.10
	不便分类从业人员	0.16	0.01	0.29	0.36
教育水平	未上过学	0.67	0.81	0.68	1.99
	小学到高中	0.84	0.86	0.99	1.02
	专科、本科	1.54	1.50	1.04	0.96
	研究生	1.96	1.19	1.07	0.08
住房来源	租赁廉租房	0.64	1.03	0.96	1.14
	租赁其他房	0.83	0.82	1.39	0.78
	自建住房	0.37	0.46	0.40	1.25
	购买商品住房	1.11	1.04	0.95	1.68
	购买二手房	1.27	1.32	0.98	1.23
	购买经济适用房	0.93	0.83	1.48	0.96
	购买原公有住房	2.30	1.95	0.68	0.20
	其他	1.35	1.94	0.86	0.49

3.1.3 住房来源主要以购买原公有住房和商品房为主 各社会阶层聚居区内住房来源存在较大差异（表2）。中产阶层聚居区住房来源主要是购买原公有住房、商品房和二手房。其中购买原公有住房的集中度指数最大为2.30，远高于其他类社会阶层聚居区。说明中产阶层内国家社会管理人员不仅拥有一定组织资源，而且仍然享有职业所赋予其再分配权力的相对优势。农民阶层聚居区的住房来源主要是以自建住房为主。一般工薪阶层聚居区的住房来源主要是以租赁廉租住房和其他住房来源为主。

3.2 中产阶层聚居区亚类划分

根据2010年广州市社会区聚类结果，对中产阶层聚居区各街道的职业、行业、教育、住房以及地理区位特征进行综合分析（表3），结合实地调查，最终将中产阶层聚居区归纳为教育、职业、收入和混合4个亚类中产阶层聚居区（图4）。

3.2.1 教育中产阶层聚居区 该区是指聚居了大量具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本科生及研究生以上集中度指数分别为1.31、2.12），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区域，又可以称为“知识技术类中产阶层聚居区”。该聚居区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的7个街道，整体呈现“带状+片状”空间结构。该聚居区内专业技术人员集聚度最高，主要是从事教育、科学研究行业，具有较强专业技术性的高学历群体。该群体住房来源主要以购买原公有住房（1.29）和购买商品住房（1.03）为主，其中购买原公有住房的最为密集，说明了教育中产

表3 2010年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亚类间职业类型、教育水平、住房来源集中度指数  
Tab. 3 Concentration ratio of occupation types, education levels and housing sources  
for sub-social areas of middle class of Guangzhou in 2010

中产阶层聚居区亚类	教育中产阶层 聚居区	职业中产阶层 聚居区	收入中产阶层 聚居区	混合中产阶层 聚居区	
街道及分布	五山街、黄花岗街、新港街、赤岗街等7个街道，集中在中心城区	东湖街、农林街、洪桥街、建设等12个街道，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老城区和郊区	素社街、南源街、彩虹街、昌岗街等12个街道，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的荔湾片区和海珠区西部	南石头街、鱼珠街、东沙街、黄埔街等8个街道，集中分布在近郊区、紧邻老城区的中心城区	
空间形态结构	带状+片状	片状	块状	片状	
职业类型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	1.27	1.40	0.50	0.64
	专业技术人员	1.28	0.99	1.07	0.77
	办事人员	1.12	0.94	1.21	0.88
	商业服务业人员	0.78	0.91	1.45	1.11
教育水平	专科	0.93	1.05	1.21	0.73
	本科	1.31	1.04	1.03	1.01
	研究生	2.12	0.95	0.62	0.97
住房来源	购买商品住房	1.03	0.72	1.96	1.07
	购买二手房	0.84	1.28	1.03	0.96
	购买原公有住房	1.29	1.66	1.01	0.72

阶层聚居区住房来源大多是由单位原福利房等原公有住房转变而来。

**3.2.2 职业中产阶层聚居区** 该区是指聚居了大量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及相关办事人员的区域,又可以称为“行政与管理类中产阶层聚居区”。该聚居区分布在老城区内的2个街道、中心城区的8个街道、近郊区的2个街道,整体呈“片状”分布在中心城区和郊区地区。该聚居区内教育程度主要以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为主。职业类型主要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为主。该群体住房来源主要是购买原公有住房和购买二手房,其中购买原公有住房集中度最高(1.66),其次是购买二手房(1.28)。较高的购买原公有住房集中度说明了职业中产阶层聚居区体制内人员较多,大多数人员凭借其职业性质的优势购买该类型住房的机会较大。

**3.2.3 收入中产阶层聚居区** 该区是指聚居了大量以商业服务业人员和办事人员为主的人群的区域,又称为“服务业类中产阶层聚居区”。该聚居区内商业服务业人员密集度最高,其次是办事人员。该聚居区分布在12个街道,整体呈“块状”分布在中心城区以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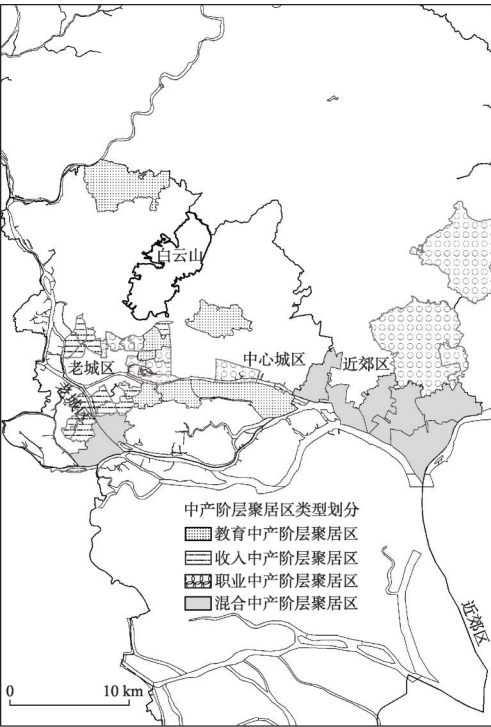


图4 2010年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类型划分及其空间分布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social sub-areas of Guangzhou in 2010

紧邻职业中产阶层聚居区和教育中产阶层聚居区分布。教育程度主要以大学专科(1.21)和本科学历(1.03)为主。该群体住房来源相对多元化。

**3.2.4 混合中产阶层聚居区** 该聚居区空间分布集中在8个街道,呈“片状”集中分布在紧邻中心城区的近郊区。该聚居区内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主导职业类型,每个类型的职业空间分布较为均衡。教育程度主要以大学本科人员(1.01)为主。该群体住房来源主要是以购买商品住房(1.07)为主。

4 2000-2010年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与地域类型演变

采取同样的方法,2000年广州市社会区划分同样可以划分为阶层混合聚居区、中产阶层聚居区、一般工薪阶层聚居区、农民阶层聚居区和工人阶层聚居区五类聚居区,并对2000年中产阶层聚居区内部亚类进行划分(图5)。通过比较2000年和2010年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布(图6),总结广州市2000-2010年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布与地域类型演变特征。

4.1 中产阶层聚居区区域范围有所扩大,呈现郊区化与向中心性并存现象

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范围不断扩大,呈现郊区化与向中心性并存的现象(图5,图6)。2000年中产阶层聚居区范围包括26个街道,其中老城区街道2个;2010年中产阶层聚居区范围内街道达到39个,其中老城区街道4个,郊区街道9个。老城区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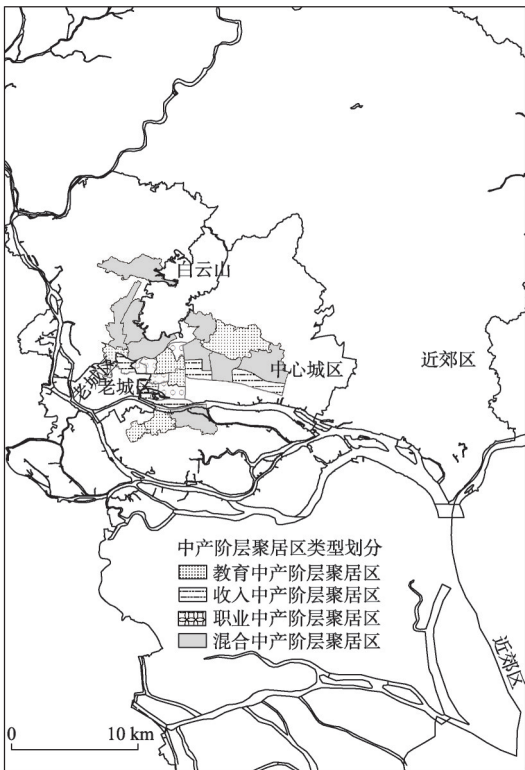


图5 2000年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类型划分及其空间分布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social sub-areas of Guangzhou in 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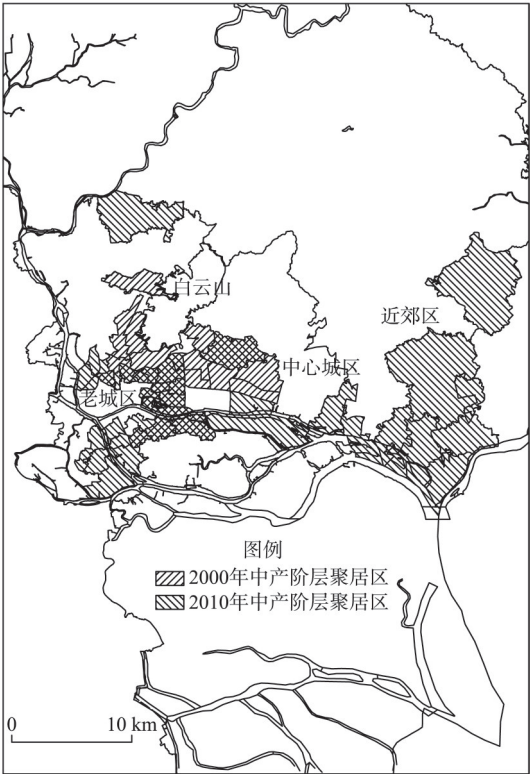


图6 2000-2010年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布对比

Fig. 6 Comparison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social areas in Guangzhou from 2000 to 2010

道数目有所增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州市老城区出现了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层化现象。这一点与已有学者对广州中产阶层化研究的结果相类似。随着广州旧城更新政策的实施,老城区内个别原有的高密度人口、居住拥挤的街道逐渐被中高收入阶层所取代的现实存在。郊区街道的增加说明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布呈现明显郊区化趋势。

#### 4.2 老城区外围、珠江两岸及经济开发区是中产阶层集中分布的区域

紧邻老城区外围、珠江两岸、新经济开发区是广州市中产阶层集中分布的区域(图5,图6)。其中昌岗街、新港街、五山街、梅花村街、黄花岗街、沙河街、东湖街、农林街、建设街、白云街、大东街、东风街、洪桥街等街道,这些街道集中于东山片区和高教片区,其中东山片区过去是老广州达官显贵的聚居区,现为广东省和广州市行政中心集中地。琶洲街、均禾街、员村街、荔联街、永和街、东区街、南石头街、东沙街、夏港街、南岗街、穗东街、红山街、鱼珠街、黄埔街等街道主要集中在珠江两岸。

#### 4.3 中心城区外来人口的集聚促使中产阶层的外迁

中产阶层聚居区范围内一些街道发生改变,原属于中产阶层聚居区类型的街道消失(图5,图6)。这些街道主要包括流花街、天园街、天河街、石牌街、林和街、登峰街、棠下街、兴华街、景泰街、黄石街、三元里街等街道。从空间分布来看,这些街道主要集中在紧邻老城区与中心城区交汇的区域,这些区域集中了大量的城中村,外来人口的不断积聚促使中产阶层不断迁出。

#### 4.4 中产阶层聚居区亚类发生变化

##### 4.4.1 4个亚类中产阶层聚居区呈现街道数目变化和类型转换

除了混合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范围有所减小以外,教育中产阶层聚居区、收入中产阶层聚居区和职业中产阶层聚居区3个亚类聚居区街道范围都有所增加(图7)。其中,职业中产阶层聚居区和收入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范围扩大最快。街道数量由2000年的5个增加到2010年的12个,增加了7个街道。收入中产阶层聚居区街道数量由2000年的6个增加到2010年的13个,增加了7个街道。教育中产阶层聚居区增加幅度最小,街道数量由2000年的6个增加到2010年的7个,仅增加了1个。这也说明了教育中产阶层聚居区相对于其他聚居区内部构成和空间分布较为稳定。除了4个亚类中产阶层聚居区街道数目变化以外,其内部所属街道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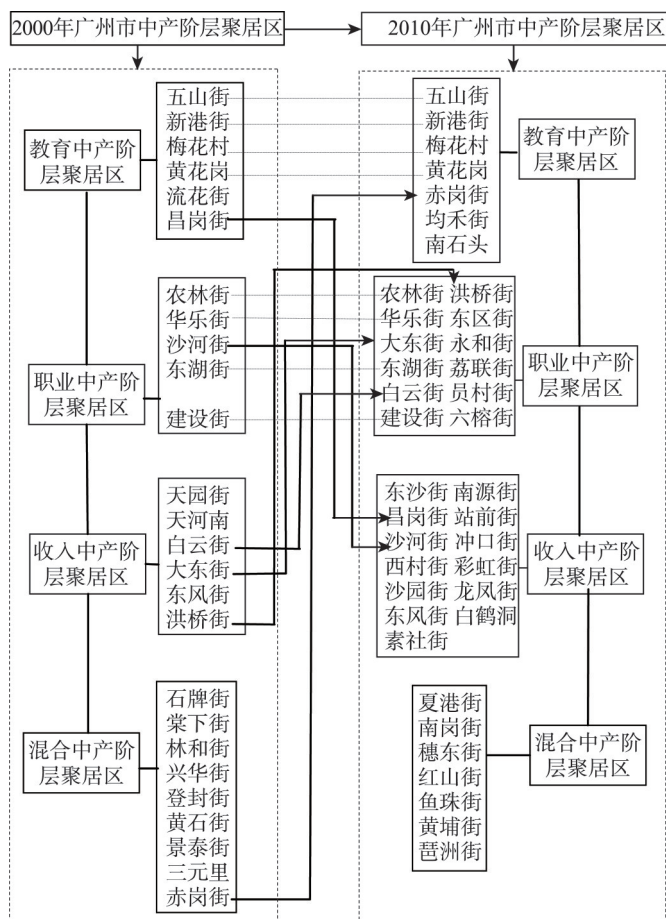


图7 2000-2010年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街道类型变化

Fig. 7 Changes of sub-districts in the middle class social areas of Guangzhou from 2000 to 2010



型也在发生转变。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混合阶层聚居区向教育中产阶层聚居区转变；收入中产阶层聚居区与职业中产阶层聚居区之间的互相转变。

发生类型转换的街道主要是昌岗街、赤岗街、大东街、白云街、洪桥街及沙河街等。从空间分布来看，这些街道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和老城区。这也说明了这些街道内存在较强的社会阶层流动。

**3.4.2 中产阶层聚居区呈现强稳定型、弱稳定型、衰减型和增长型 4 种不同地域类型演变** 根据熵权法<sup>[33]</sup>计算得出 2000 年和 2010 年中产阶层聚居区评价指标综合值。将该值放在同一个坐标系中，其中 *X* 轴表示某一指标 2010 年的区位熵，*Y* 轴表示某一指标 2000 年的区位熵，以区位熵 1 为参考值，将中产阶层聚居区范围内地域类型划分为 4 种演变类型：强稳定型、弱稳定型、衰减型和增长型（图 8）。为了更加直观地体现广州中产阶层聚居区地域类型演变特征，借助 GIS 软件将其空间可视化，得到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内部不同地域类型空间分布图（图 9）。

强稳定型主要体现在某一指标的区熵值 2000 年、2010 年均大于 1 的地域类型。该类型主要包括越秀区的白云街、东湖街、大东街、梅花街、农林街、洪桥街、华乐街、黄花岗、建设街、流花街，海珠区的新港街、昌岗街、赤岗街，白云区的景泰街，天河区的天园街、石牌街、五山街、林和街、天河南街、棠下街等 20 个街道。呈现强稳定型状态的聚居区主要是教育中产阶层聚居区和职业中产阶层聚居区，该类型聚居区集中分布在广州市中心城区的核心位置。

弱稳定型主要体现在某一指标的区位熵值 2000 年、2010 年均小于 1 的地域类型。该类型主要包括荔湾区的东沙街、南源街、彩虹街、站前街、西村街、冲口街、白鹤洞街，萝岗区的东区街、夏港街、永和街，黄埔区的南岗街、穗东街、红山街、鱼珠街、荔联街、黄埔街等 21 个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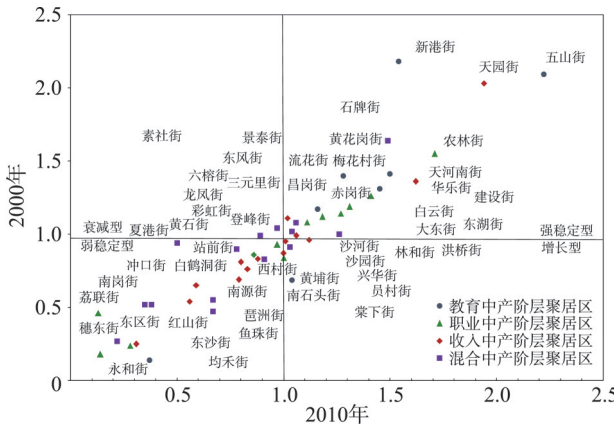


图 8 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亚类变化情况  
Fig. 8 The changing condition of the four sub-areas of the middle class in Guangzh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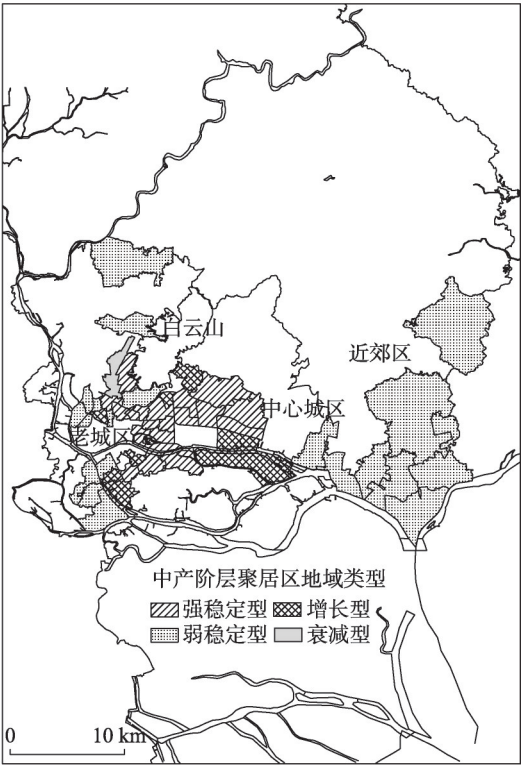


图 9 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变化类型及分布  
Fig. 9 The changing typ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social area in Guangzhou

道。呈现弱稳定型状态的聚居区主要是收入中产阶层聚居区和混合中产阶层聚居区。该类型聚居区空间分布呈“环状”围绕在紧邻老城区的中心城区和郊区地带。

增长型主要体现在某一指标的区位熵值 2000 年小于 1, 而 2010 年大于 1 的地域类型。该类型主要包括海珠区的南石头街、沙园街、琶洲街、素社街, 天河区的沙河街、员村街、兴华街以及越秀区的东风街等 8 个街道, 呈现增长型状态的聚居类型主要有混合中产阶层聚居区、教育中产阶层聚居区及收入中产阶层聚居区。该类型聚居区空间分布呈“散点状”零星地集中分布在强稳定型和弱稳定型之间的珠江沿岸地区。

衰减型主要体现在某一指标的区位熵值 2000 年大于 1, 而 2010 年小于 1 的地域类型。该类型聚居区内只有白云区的三元里街, 主要包含混合中产阶层聚居区。该类型空间分布呈“点状”集中在紧邻强稳定型的老城区外围。

## 5 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

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可以从阶层分化、市场力量、全球化、历史延续、政策力量和个体力量等方面进行考虑(图 10), 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 5.1 社会阶层分化促进了中产阶层群体的出现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中国基尼系数逐年上升。2003 年为 0.48, 2008 年达到最高点 0.498, 之后逐渐回落, 到 2010 年为 0.48。表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拉大, 社会阶层化现象凸显。广州市基尼系数自 2000 年以来一直都是高于 0.5。据 2003 年中共广州市委党校与广州行政学院做的“广州社会阶层变化及其政治影响”实证性调查研究<sup>[34]</sup>, 无论是阶层之间还是阶层内部, 收入差异日益明显。中产阶层的不可避免的出现, 其规模不断的扩大。

### 5.2 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为中产阶层集聚区的形成提供了空间

不同的阶层群体, 其购房的能力与住房需求差别较大。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 高档商品住房、经济适用房、保障性住房等多样化住宅的建设满足了不同阶层群体的住房需求, 对城市社会空间带来巨大影响。广州市高档商品住房较为集中的传统区域主要集中在二沙岛、天河北、珠江新城、滨江一线等片区。现高档商品住房逐渐向番禺、奥体、科学城、南沙等区域集中。2010 年广州亚运会的举办带来外围区域的城市规划、配套设施等方面得到大大提升, 未来板块价值逐渐彰显, 住宅价值也得到体现。黄埔区、萝岗区、番禺区等成为房地产开发的热点区域, 黄埔花园、岭南山畔等大型高档社区的涌现, 成为“渴望远离闹区, 向往外围较好生活”的中产家庭居住选择的理想之地, 进而促进中产阶层聚居区郊区化以及郊区中产阶层聚居区的形成。

### 5.3 全球化下的个体响应与地方响应促进了中产阶层聚居区的发展

全球化浪潮激发了中产阶层对社会身份认同, 改变了发展中国家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 激发了其对自身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身份认同的需求, 为中产阶层聚居区的形成提供了动力。二沙岛、华南新城、南国奥林匹克花园等高档社区内各类高级会馆、高尔夫球场等设施的建设可视为广州市地方响应全球化的最佳证明。这些高档设施成为居住其区域内社会人士炫耀其社会地位及强化自身社会身份认同的一种标志。此外广州科学城、琶洲国际博览馆、白鹅潭经济圈、国际生物岛、广州经济开发区等地方凭借优越的发展条件, 吸引知识型产业和高端人才入驻, 成为未来中产阶层聚居的高地。

### 5.4 传统社会空间的历史延续是中产阶层聚居区形成的稳定基础

原东山区的梅花村、农林、东湖等街区历史上就是官宦衙门(行政部门)等具有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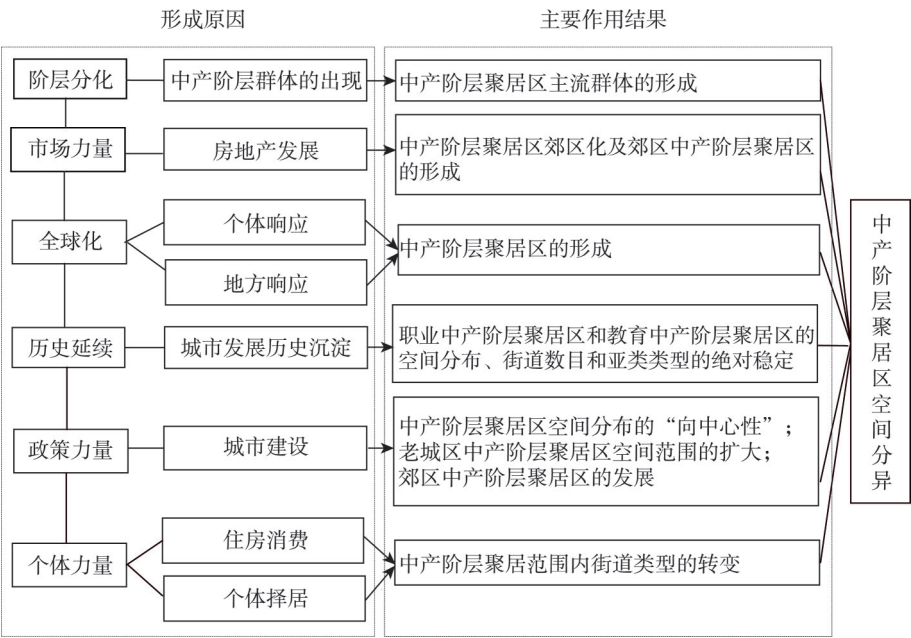


图 10 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异形成机制  
Fig. 10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middle class areas in Guangzhou

高社会职业等级的人群的聚居地。民国时期外国传教士、归国华侨的投资房地产热潮和官僚政要官邸的兴建加速了该地区达官显贵等社会阶层的聚居，进而造就其稳固的政治经济地位。广州传统的“西富—东贵”的社会空间格局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广州职业中产阶层云集之地。天河区的五山高教区和海珠区的新港中大高教区一直以来都是广州市的教育重区，文化氛围浓厚，吸引大量教育中产阶层在此聚居。传统城市社会空间的历史延续为教育中产阶层聚居区和职业中产阶层聚居区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

5.5 个体力量和城市规划建设促使中产阶层聚居区类型及空间转变

中产阶层自身社会认同感较强，这个特点促使其在居住选择上更加倾向于具有与其同等社会地位的社区。因此，这种较强的自身社会认同感为中产阶层聚居区的形成提供了需求动力。中产阶层个体住房消费、居住变迁则为中产阶层聚居区类型转变和空间演变提供了内在动力。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中产阶层可以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生命历程变迁及居住选择偏好改变家庭居住的空间，进而带来中产阶层聚居区内部街道类型的转换。相反，经济实力较差的低收入阶层则在房地产市场上逐渐被边缘化或固守在原地，主动进行家庭居住空间变动的可能性较小。

随着城市的发展建设，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不断完善，老城区如东风街、洪桥街等街道出现各式高级楼盘，这些新建高档楼盘加速了原有低收入阶层的外迁，以中产阶层为主的较高收入者取而代之成为新居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产阶层空间演变的向心性特征。随着城市外围开发区的发展建设，大型高档楼盘的开发建设，吸引着倾向于这种生态化、优质化的居住环境和高档次的生活质量的中产阶层聚居于此，逐渐发展成为郊区中产阶层聚居区。

6 结论

(1) 中产阶层聚居区已成为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中一个重要而独立、并不断发展扩



大的区域。主要体现在中产阶层聚居区内群体具有较高等级的职业类型,较高层次的受教育水平和较好的住房条件,可以划分为教育、职业、收入和混合4种亚类中产阶层聚居区;中产阶层聚居区呈现强稳定型、弱稳定型、衰减型和增长型4种不同地域类型的演变,其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呈现郊区化和向中心性扩展并存,但仍以中心城区分布为主;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异主要受社会阶层分化、房地产市场、全球化、传统社会空间、个体力量和城市建设等多方面机制原因综合作用。

(2)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中产阶层空间分异特征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一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大城市中产阶层空间分布均呈现出中产阶层回迁的现象,回迁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旧城更新后的新建住宅区,并与其他社会阶层聚居区表现出一定的居住隔离;二是中产阶层聚居区集中分布在交通便利、生态环境良好的区域。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中国大城市中产阶层空间分布虽有向郊区发展的趋势,但目前仍是以市中心为主;西方国家中产阶层空间分布仍以郊区为主。

(3)目前,中国中产阶层仍处于上升阶段,该群体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群体。中产阶层被视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在国家政策制定中,中产阶层扮演着重要的战略性群体角色。较高的收入水平、稳定的社会地位和高层次的教育水平使其在居住选择、日常生活行为空间、生活价值观念等方面与其他阶层不同,并影响到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变化。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在制定城市规划及城市更新等方面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到该群体的住房消费和生活价值趋向,避免发生类似西方国家因大量中产阶层迁至郊区造成中心城区竞争力下降等问题。

(4)本文采用人口普查数据对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布及地域类型演变进行分析,试图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对其形成机制进行探讨。但居住空间分异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中产阶层作为其聚居区的主体,个体力量如何在微观层面上作用于聚居区的形成将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Ley D. The New Middle Clas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Central C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34-236.
- [2] Wright E O. Classes. London: Verso Books, 1985.
- [3] Mills C W.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63-65.
- [4] Bell D.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57-58.
- [5] Park R E, Burgess E W, McKenzie R D. The Cit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25.
- [6] Hoyt H. Recent distortions of the classical models of urban structure. Land Economics, 1964, 40(2): 199-212.
- [7] Harris C, Ullman E L. The nature of citi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45, 242: 7-17.
- [8] Guest A. Population suburbanization in American metropolitan areas, 1940-1970. Geographical Analysis, 1975, 7(3): 267-283.
- [9] Gans H. The Levittowners: Ways of Life and Politics in a New Suburban Community. New York: 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 [10] Kent E E, Oliver P W. The chang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cial classes in a metropolitan area. Urban Affairs Review, 1978(13): 313-338.
- [11] Karsten L, Lupi T, Speksnijder M D. The middle classe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suburban family community: Evidence from the Netherlands. Journal of Hous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2013, 28(2): 257-271.
- [12] Ley D. A Social Geography of the C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3.
- [13] Butler T, Robson G. Social capital, gentrification and neighbourhood change in London: A comparison of three South London neighbourhoods. Urban Studies, 2001, 38: 2145-2162.
- [14] Karsten L. Family gentrifiers: Challenging the city as a place simultaneously to build a career and to raise children. Urban Studies, 2003, 40(12): 2573-2584.



- [15] Karsten L. Housing as a way of life: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middle-class families' preference for an urban residential location. *Housing Studies*, 2007, 22(1): 83-98.
- [16] Bell W. Social choice, life styles, and suburban residence//Dobriner W M. *The Suburban Community*. New York, 1958: 225-247.
- [17] Bell W. *The City, the Suburb, and a Theory of Social Choice. The Rise of the Rustbel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8: 132-168.
- [18] Bridge G. It's not just a question of taste: Gentrification, the neighbourhood and cultural capital.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6, 38(10): 1965-1978.
- [19] Boterman W R, Karsten L, Musterd S. Gentrifiers settling down? Patterns and trends of residential location of middle-class families in Amsterdam. *Housing Studies*, 2010, 25(5): 693-714.
- [20] Wu Qiyang, Cui Gonghao. The differ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residential space in Nanjing and its mechanism. *City Planning Review*, 1999, 23(12): 23-35. [吴启焰, 崔功豪. 南京市居住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城市规划*, 1999, 23(12): 23-35.]
- [21] Gu Chaolin, Wang Fahui, Liu Guili. Study on urban social areas in Beijing.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3, 58(6): 917-926. [顾朝林, 王法辉, 刘贵利. 北京城市社会区分析. *地理学报*, 2003, 58(6): 917-926.]
- [22] Zhou Chunshan, Liu Yang, Zhu Hong. Analysis on social areas of Guangzhou city during the economic system transform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6, 61(10): 1046-1056. [周春山, 刘洋, 朱红. 转型时期广州市社会区分析. *地理学报*, 2006, 61(10): 1046-1056.]
- [23] Meng Yanchun. Gentrifi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renewal.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0(1): 48-51. [孟延春. 旧城改造过程中的中产阶层化现象. *城市规划汇刊*, 2000(1): 48-51.]
- [24] Wang Xingzhong, Gao Li. Gentrification and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recreational places in big cities. *Human Geography*, 2008, 21(2): 49-55. [王兴中, 高丽. 大城市中产阶层化与商娱场所的空间结构. *人文地理*, 2008, 21(2): 49-55.]
- [25] Song Weixuan, Zhu Xigang, Wu Qiyang.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and comments of gentrification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0, 34(4): 14-20. [宋伟轩, 朱喜钢, 吴启焰. 中国中产阶层化过程、特征与评价: 以南京为例. *城市规划*, 2010, 34(4): 14-20.]
- [26] He Shenjing, Qian Junxi, Xu Yuxuan, et al.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amidst rapid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xiaozhou village, Guangzhou.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8): 1044-1056. [何深静, 钱俊希, 徐雨璇, 等.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绅士化的时空演变特征. *地理学报*, 2012, 67(8): 1044-1056.]
- [27] Bian Yan, Zhou Chunshan, Zhang Guojun. Research on middle class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udies in China.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5, 34(4): 517-525. [边艳, 周春山, 张国俊. 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研究进展及对中国的启示.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4): 517-525.]
- [28] Bian Yan, Zhou Chunshan. Review on the studies of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in China. *Tropical Geography*, 2014, 34(1): 108-115. [边艳, 周春山. 中国中产阶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述评. *热带地理*, 2014, 34(1): 108-115.]
- [29] Zhou Xiaohong. *Surveys on the Middle Class in China*.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5. [周晓虹. 中国中产阶层调查.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30] Lu Xueyi. *Reports on the Social Cla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2.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31] Zhou Chunshan, Bian Yan. The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 Guangzhou city in 1982-2000.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34(9): 1085-1092. [周春山, 边艳. 1982-2010年广州市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演变研究. *地理科学*, 2014, 34(9): 1085-1092.]
- [32] Dai Dandan, Zhou Chunshan, Zhang Yan. Study 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middle class in Guangzhou: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6, 25(1): 137-150. [代丹丹, 周春山, 张俨. 广州市中产阶层的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实证分析. *世界地理研究*, 2016, 25(1): 137-150.]
- [33] Qiu Dong. *Systems Analysis of Multi-index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3. [邱东. 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的系统分析.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3.]
- [34] Guangzhou Party Institute of CCP, Guangzhou Administrative College Research Group. *Social Class Change and Its Political Influence*. Guangzhou: Guangzhou Press, 2006.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 广州行政学院课题组. 广州社会阶层变化及其政治影响.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6.]

##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middle class areas in Guangzhou

ZHOU Chunshan<sup>1</sup>, BIAN Yan<sup>2</sup>, ZHANG Guojun<sup>3</sup>, HU Jincan<sup>1</sup>

(1. 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for Urbanization and Geo-simulation,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chool,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3. School of Public and Management,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angzhou 510320, China)

**Abstract:** As a result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middle class in China has grown considerably and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social group, and its expanding housing demand has exerted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socio-spatial structure of c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middle class social area in Guangzhou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social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urban planning and re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fifth and sixth censuses, 148 sub-districts from 10 districts of Guangzhou in 2010 are divided into five social areas—mixed class, middle class, salaried workers, peasant class, and working class—by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hierarchical cluster methods,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ddle class social area are analyzed. Next, using a concentration index, the middle class community is divided into four sub-areas: the educational middle class, the professional middle class, the income middle class, and the mixed middle class. The same approach is then used to examin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ddle class social area in 2000. In comparison of the results from 2000 and 2010,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middle class social area in Guangzhou has experienced the following changes: (1) The middle class social area is expanding, with evident suburbanization and centralization. (2) The suburban area,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are the main areas where the middle class is concentrated. (3) The agglomeration of a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urban villages is leading to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middle class social area. (4) In each sub-social area of middle class, the number and the sub-social area they belonged to have been changing from 2000 to 2010. (5) The middle class social area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ubtypes according to their changing condition: a stable type, an unstable type, a decaying type, and a growing type. Final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the change in the middle class social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strata polarization, real estate, globalization, the historical continuity of traditional social space, individual behavior, and urban construction.

**Keywords:** middle class social area;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formation mechanism; Guangzhou